

亨利·希·曼

亨利四世

——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

上册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亨利希·曼

亨利四世

——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

董问樵译

上册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上海



XWTS 0017993

HEINRICH MANN
DIE JUGEND DES KÖNIGS
HENRI QUATRE

本书根据 Aufbau-Verlag Berlin,
1958 年版本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亨利四世——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2.25 插页 3 字数 451,000

1980 年 7 月第 1 版 198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0 册

书号 10188-76

定价 2.20 元

译 本 序

—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德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成为国内文学的主流。它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另方面与各种颓废派文学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亨利希·曼被公认为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从战斗的民主主义立场，无情地批判了威廉帝国、魏玛共和国及法西斯专政三个时期，促使德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重跻于世界文学之列。

亨利希·曼 (Heinrich Mann, 1871—1950) 出身于北德吕贝克城的资产阶级家庭，比弟弟托马斯·曼长四岁。早年在德累斯顿的书店里作过学徒，后来参加柏林菲舍尔出版社的工作。由于家庭经济情况良好，给了他在柏林和慕尼黑大学求学的机会。他在思想上深受法国启蒙哲学的影响，而在文学上则深受伏尔泰、雨果和左拉等进步作家的影响。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开始文学创作，写有不少短篇和长篇小说。长篇小说《臣仆》(Der Untertan, 1912/14) 是他早期的代表

作。书中的主题是揭露威廉帝国时代资产阶级的典型生活情况。亨利希·曼对书中主角赫斯林发展过程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德国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的整个资产阶级的批判。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亨利希·曼于一九一五年发表了著名的《左拉论》(Zola-Essay)。这是一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战斗性的政论文章，它不顾沙文主义和战争狂热的叫嚣，宣示了对于民主的信念，预言侵略战争必然失败。当时德国的文学界，在不同程度上受了战争狂热、沙文主义、种族仇恨和尼采哲学的影响。反战的呼声不仅需要明智，更需要勇气和毅力。文章一出，不仅激起了反动文人的狂怒，也引起了保守派与温和派文人的震惊。连他的弟弟托马斯·曼也认为《左拉论》所宣示的对民主的信念，是对祖国的“背叛”，并且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不问政治的人的观察》来回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托马斯·曼还一再本着自我批判的精神，承认当时哥哥思想的进步与自己思想的落后。^①

继《臣仆》以后的长篇小说有《穷人》(1917)，描写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首脑》(1925)揭露德国帝国主义的反动领导集团；以上三部作品共同组成了揭露和批判德意志帝国的三部曲。

威廉帝国崩溃以后，魏玛共和国成立。开始，亨利希·曼认为共和国是进步的和民主的国家形式，相信资产阶级社会

^① 参看：阿尔弗雷德·康托洛维茨：《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柏林建设出版社1956年版，第46—47页。

有和平改造的可能。后来，他对共和国的幻想逐渐破灭。他看到这个共和国对于纳粹的攻势毫不抵抗，而且也无力抵抗。这使他对于魏玛共和国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说：“它（魏玛共和国）的开始也就是它的结束……现在也和过去一样，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将军、大地主和工业资本家。”又说：“它从来也不是，甚至于一天也不是一个共和主义的共和国。”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篡夺政权，亨利希·曼被排斥出普鲁士科学院，他的书籍被焚毁了，他不得不逃亡国外。他在法国度过了流亡生活的最初八年。流亡生活形成了他的文学和政治活动的新阶段。一九三五年，他领导流亡国外的德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在巴黎召开的保卫文化的国际作家代表大会。他和国际的反法西斯运动保持密切联系，争取和动员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为德国人民的解放而从事不懈的斗争。一九三八年，他领导“德意志反对派委员会”，目的是联合一切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成为一个庞大而广泛的人民阵线。

他和高尔基、罗曼·罗兰、巴比塞等一起，经常反对威胁人类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一九三九年，在巴黎召开的保卫和平和民主的代表大会上，他热情地号召欧洲各国人民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威胁。他写的文章收集在《仇恨》（1933）和《勇气》（1939）两个集子里。他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是写出了他晚年的主要巨著《亨利四世》（Henri Quatre）。

一九四〇年，希特勒军队进攻法国，法国反动政府投降，亨利希·曼逃亡到了美国。他在那儿完成了《呼吸》和《世界的接待》两部小说，他的自传《观察一个时代》是根据漫长而艰苦的生活经验写成的。

在流亡时期，亨利希·曼的文艺思想起了深刻的变化。他决定走出个人主义的“象牙之塔”，去接近广大人民群众，和他们联合起来。

一九四一年，当希特勒德国的法西斯军队横扫欧洲、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时候，亨利希·曼预言：法西斯侵略军一定要遭到彻底的失败。

亨利希·曼深信德国有光明和美好的未来，他一生都在为这个未来而战斗，认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国，一种正义的和平，都会必然来到，即使有人暂时还想阻碍它，也终究是枉然的。可是他已经身罹重病，不能回到德国，一九五〇年三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小城圣莫尼卡病逝。

亨利希·曼深刻体会到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重要性，这可以说是他那个时代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在认识上所能达到的顶点了。

二

赫尔伯·叶宁(Herbert Jhering)在他所写的亨利希·曼的传记中说：“纵然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把十六世纪的一切文字证件都销毁无余，而单单剩下一部《亨利四世》，那末，我们仍然具有那个时代的文献，使我们对于它的生活、精神、科学、艺术和风俗获得一种概念。”

《亨利四世》包括两部：上部是《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Die Jugend des Königs Henri Quatre)，下部是《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Die Vollendung des Königs Henri Quatre)。亨利希·曼于一九二五年旅行法国南部，参观了比

利牛斯山麓的波城王宫。当时他就决心写这部作品，经过七年的酝酿，计划逐渐成熟，又经过六年——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八年——的努力写作，本书才告完成，那时他六十五岁，正过着流亡生活。

根据德文原版《后记》中的考证，作者涉猎的资料范围是相当惊人的。不仅蒙田的《散文集》(Essais)，伏尔泰的《亨利颂》给了他以极大的启发和影响，他还研究了德国历史学家朗克的《法国史》中关于亨利四世的生活、事业和历史意义的叙述。此外，如摩尔内的回忆录，苏利的传记文，以及其他有关法国宗教战争时代的作品，都经过他细心研究。可惜他收集的资料都在流亡时期散失了。据载至今只保存着他手批过的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所著《法国革命史》共七册，他的旁批和脚注以及每册书末空白上的补记等，收集起来可以独自成册，由此可以窥见亨利希·曼熟悉法国历史的一斑。

亨利希·曼所以选择十六世纪宗教战争这个典型的历史时代和亨利四世这个典型的历史人物，是根据下列的理由，因为这个时代是欧洲的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时代，是封建主义没落和资产阶级上升的时代。法国成了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巴黎是它无可非议的首都。在亨利四世的身上，体现着王权的原则，而王权在当时封建割据和普遍的混乱状态中代表民族的统一，所以它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上是进步的因素。至于王权取得最后胜利以后，加强对人民的奴役和掠夺，那是亨利后代的事情。

从一五六二到一五九四年，封建割据的法国连年发生内战，这种名为胡根诺战争的宗教战争，实际上是封建势力和新

兴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胡根诺教徒基本上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反动的封建贵族则组成了天主教同盟。连年内战使国内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广大人民要求停止内战，恢复和平统一，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亨利四世顺应人民的要求，结束了宗教战争，击退西班牙的干涉，颁布了平等的信仰宗教的权利。他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执行新的政策，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这样，亨利四世得到人民的拥护，同时也引起了反动封建贵族的憎恨，终于在一六一〇年被刺身死。

亨利希·曼作为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士，作为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不是简单地用艺术手腕再现一定的历史时代和历史人物，而是怀着炽热的感情，企图唤起德国和法国人民联合起来，向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他自称他的这部小说是“一个真实的譬喻”，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切爱国主义者，不管本身的信念和世界观如何，必须联合起来，防止人民和国家遭受掠夺，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制止出卖民族于外国侵略者所造成的空前浩劫。

在小说中，作者虽然没有明确的阶级分析，然而他本着他固有的民主主义的立场，揭露出那个时代的矛盾，同时在新与旧、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斗争中，显示出同情前者的鲜明倾向性。

三

《亨利四世》是一部百余万字的巨著，主要写的是：法国南

部有个名叫那瓦拉的小王国，王子亨利渐渐长大起来。那时正是宗教战争进行得十分炽热的时期。一旦法国王室瓦卢瓦家族绝了后代，亨利作为王室近亲波旁家族的后裔，就获得法兰西王位的继承权。可是这么一来，他被卷入贵族集团的权力斗争中去了。那一边是天主教贵族集团，他们代表大封建地主的利益，组成天主教同盟。首领是洛林家族的吉士公爵，他依靠西班牙的支持，接受唐·菲利普的黄金和武器，出卖法国的主权和利益。这一边是胡根诺教徒，即喀尔文教徒，他们代表上升的资产阶级及一部分受到损害的中小贵族的利益。他们的首领开始是亨利的母亲珍妮王后和柯里尼大将，两人死后，则是亨利自己。

一五七二年，双方试图休战。亨利·那瓦拉与国王查理九世的妹妹玛甘莉特结婚。亨利带了大批新教的贵族来到巴黎。法国太后麦第奇与吉士公爵勾结，阴谋趁机把胡根诺教徒一网打尽。八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的夜间，即圣巴托罗牟节日的前夕，在约定的时刻，巴黎各处教堂鸣钟，随着这一信号的发出，天主教徒便开始出其不意地屠杀正在睡梦中的胡根诺教徒。早在前一天的夜里，胡根诺教徒的住屋都给涂上了白十字。这次惨杀就叫作“血腥的巴托罗牟之夜”。许多外省城市也发生了同样的屠杀，死者成千上万。亨利靠查理九世的掩护，才幸免于难，但被迫改奉天主教。

他度过了长期的俘虏生活，含垢忍辱，养精蓄锐，终于逃脱虎口，与南方的胡根诺教徒重新取得联系。后者的据点都在南方，特别是沿海一带的要塞城市，这儿保证了资产阶级的权利，也给亨利提供了避难所，使他以此为根据地，一步一步为

争夺王国而斗争。当时的农民是最受压迫的阶级，由于连年混战，弄得土地荒芜，疮痍满目，苛捐杂税逼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年青的亨利早已看出，双方借口为了宗教信仰而进行的战争，所付的代价太大了。后来，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蒙田对他说：“显而易见，一切宗教战争都不外乎是撕裂法国的行为。”这深深地影响了他。

他虽然率领胡根诺教的军队打败了天主教同盟的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首都巴黎的大多数居民是天主教徒，而西班牙侵略军又驻在城里，为了早日解围，不让城内居民成为饿殍，他仍然改奉了天主教。所以他说：“为了巴黎，值得做场弥撒。”一五九六年，他颁布了南特敕令，给予胡根诺教徒与天主教徒平等信仰的一切权利，这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宣布和保证宗教平等权利的文件。

亨利坚持不懈地经过重重障碍，克服种种困难，以达到民族的统一。他积极促进手工业的繁荣，废除国内的关税壁垒，使省区之间的贸易畅通，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他说：“至少让他们的罐子里星期日有只炖鸡吃。”他叫人在鲁佛宫里给手工业工人辟了工场，工作的喧闹声音使宫廷人员惶惶不安。财政大臣苏利秉承国王的旨意，推行一种不仰给外国的独立财政政策。他付出大量资金，疏通河道，发展农业，种植玉米、甜菜、松子、香橙和无花果，精制皮革，发展丝织品、地毯和瓷器等。苏利曾说：“农业和牧畜是供养法国的双乳，可比真正的矿山和秘鲁的宝藏。”

亨利努力争取得到人民的信任。有一次一位宫廷贵族虐杀了一个农村姑娘，亨利一反常规，叫人把这个贵族在巴黎的

格雷佛广场上当众处死。后来亨利踏上了登基之路，他知道非争取得到广大农民，即人民的支持不可。他授权摩尔内起草《告王国全国人民的宣言》，它的内容大致如下：

他问：究竟一切悲惨的战争，残忍的暴行，牺牲了千万人的生命，浪费了堆积如山的黄金，得到了什么结果呢？他回答说，实际上是让读者回答：结果是人民穷困了，国家患了不治之症，灾难永无止境。他问：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情况会怎样呢？他先问贵族和市民，立刻根据他们本身的利益来回答。然后他加强语气，向人民（实即农民）说话，把人民叫作王国的谷仓，国家的粮田，他们的劳动给君王解饥，他们的汗水给君王止渴。人民啊，贵族用脚践踏你，你想投靠谁呢？……城里的市民，只会吸取人民的膏血。两方面都不可靠，人民只有投靠国王。只有国王才能保证和平与安全。

当他战胜了西班牙，签订和平条约的专使到来时，他正带领着侍从人员在卢瓦尔河的岸边。农人们从田地上跑来。“大伙儿都怀着期待的心情，没有说话，只望见国王的嘴唇在动，但听不出他说的什么。最后才传来了‘和平！和平！’这是兵士们的声音。接着国王轻轻地说：‘孩子们，你们得到和平了。’一部分人听出国王的第一句话，凝视着他的形象，另一部分人听出他第二句秘密的话，就正视着他的眼睛。他们等了一会儿，仔细瞧着他，慢慢地跪下去——开始不过几个人，后来大伙儿都一齐跪下去。有一个年青力壮的农人，直挺挺地站在他们当中，他说：‘主人！您是我们的国王。要是您遇到什么危险，就叫我们来吧。’”

这是书中一段生动的描写。亨利对宗教教义始终抱着淡

漠的态度，而最服膺人文主义者蒙田的名言：“我何知？”（Que sais-je）。这不仅使得任何宗教教条都成问题，而且也表示出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

亨利怀着更远大的抱负。他当着北德吕贝克的市议员发挥他的“大计划”说：“高明的绅士们，你们了解我的大计划。这儿有篇账目：一种完全靠军备所强致的和平，是浪费金钱的……我和我的同盟者都会明白，利益和安全是在哪里。”利益和安全，这正是上升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自由贸易所追求的东西。亨利的计划类似一种国际联盟的组织，想用集体力量来反对外来侵略者，并制止新的战争。他说：“我知道什么是宗教战争，在我有生之年，再也不许任何人挑起这样一种战争。”

法国比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在早一个阶段上达到统一，建立和巩固了民族国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不能不归功于亨利，他的事业的完成就在这儿。

然而亨利的行为激起了封建贵族的仇恨和嫉妒，也给自己带来了危险，而出卖他的是他的宫廷。宫廷与罗马教皇和西班牙国王勾结起来，由耶稣会秘密派遣凶手将他刺死。他的敌人最恨他的是：他虽然表面上改奉天主教，而实际是个“隐藏的”基督教徒。

亨利死后，后代继承了他开创的基业。但是当专制主义废除南特敕令，加强对市民和农民的压迫和剥削时，法国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那时坐在国民大会里的不是新教徒，而是无神论者；而百科全书派继承了十六世纪人文主义者的遗产。无可否认，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国找到了达到胜利的有

利场地，而这一革命又给现代民族创造了进步的历史前提。这就是《亨利四世》这部长篇小说中的远景，作者虽然没有加以表现，却已经透露出来了。

四

亨利希·曼是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士，他始终站在战斗的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从事写作。他在本书中突出了十六世纪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他把亨利四世塑造为一位开明的君主。书中通过道宾芮的口说出如下的话：

“总的说来，殿下，你不过是善良的老百姓把你塑造成功的啊。不过你倒可以更高一些，因为作品有时是高于艺术家的，但你千万不可以作一个暴君呀！反对一个厚颜无耻的暴君，就连下级官吏也从上帝那儿得到一切权利。”

十六世纪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把王侯看成是由人民造成的，并表达出了反对暴君的思想，这成了后来启蒙时代“社会契约论”的起源。

亨利四世在长期的宗教战争中，经过巴托罗牟的恐怖之夜和鲁佛宫里的俘虏生涯，以及继承王位和统一法国的艰巨斗争，对当时人民的疾苦和国家的实际状况多少有所了解。人文主义者蒙田在《海滨对话》一段中对他说：“暴力固然强，但是宽容和爱人的力量更强，没有什么比宽容厚道更得人心而具有人民性。”这对亨利的思想发展很有影响。他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并发挥其积极的和战斗的精神。在《人间天上》一段中，通过洛尼的口说出：“咱们赞成全世界的人文主义者，但

是人文主义者如果只会思想，而没有学会骑马打枪，那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的。”

亨利四世的前半生经历酷似莎士比亚剧中的丹麦王子汉姆雷特，他的母后被害，自己成为俘虏，失去继承王位的希望。不过他在思想上更积极、更坚定，在行动上更果敢、更有战斗性。以上都在书中表现出来了。

但是人文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早期的意识形态，是有局限性的，它的核心是个人主义，没有广泛的民主基础，在一个专制君主的身上更有很大的局限。亨利四世固然有爱国主义的思想，有革新社会的行动，然而他一心一意还是为了继承王位和巩固王权。他的仁慈除了出于恩施观点而外，往往是出于权术上的需要。他的人文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断妥协的倾向。他犯的重大错误是对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不够彻底。例如以俸禄、恩赏和职位收买旧教大领主，宽容耶稣会会员，对佛罗伦萨麦第奇家族的屈服，终于酿成可悲的结局。

在艺术特点上，这部小说有广阔的场面，错综的情节，细腻的人物描写和性格刻画。场面从比利牛斯的崇山峻岭，到鲁佛宫的广厦华堂；从巴黎到伦敦；人物从幕内操纵法国政治的凯瑟琳太后，到企图统治世界的唐·菲利普。有缠绵的儿女柔情，有轩昂的英雄侠气；有宫廷的钩心斗角与战场的铁马金戈，此伏彼起，互相呼应。人物性格极为生动：主角亨利显得机智、勇敢、热情、幽默，有坚强的意志，及达到和贯彻目的的决心，但他也轻浮放荡，晚年迷恋宠姬，对后来波旁王朝的淫靡风气，不能推卸始作俑者的责任。除主角而外，其他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经作者大笔勾勒，也栩栩欲活；凯瑟琳太后的阴险，

珍妮王后的自信，玛果的热情放纵，嘉德琳的纯洁天真，查理九世的庸愚，亨利三世的暗弱，亚利松公爵的冒失，孔德王子的浮躁，以上是两大家族人物的特征。至于吉士公爵的骄狂，马因公爵的贪鄙，蒙庞西埃公爵夫人的泼辣，这一家族的反面人物也经作者刻划尽致。关于与主角亨利有关和环绕他的人物，柯里尼则是虔诚而固执，蒙田则是深沉而明达，道宾芮多艺多才，摩尔内临危不苟，洛尼的精明干练，德尔贝夫的见义勇为，达马涅克的忠诚不二等，都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书中刻划人物，绘影绘声，描摹世情，穷形尽态。作者常把直接对话与间接对话、外部描写与内心分析交错起来，掀起文笔的波澜，加强抒情的旋律。他的语言亦端庄，亦流丽，亦刚健，亦婀娜。

但是也应该指出：书中虽然表现出主角发展的过程，但那种环绕和决定主角发展的客观环境似乎还表现得不够。例如：胡根诺集团与天主教同盟的对立，虽然前者基本上代表上升资产阶级的利益，后者基本上代表封建大地主的利益，但是南北两大集团内部也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社会成份，引起每一集团内部激烈的社会斗争。在参加胡根诺共和国的南部各城市，很快地展开了喀尔文教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两者之间的斗争，而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平民的各阶层又起来反对两者。在天主教同盟内部也发生了同样的斗争。从天主教同盟中分化出资产阶级和城市下层民众的组织“巴黎联盟”。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由于人民起义（“街垒日”）的结果，把国王亨利三世赶下了王位，由民主成份组成的“十六人委员会”取得了政权。其他城市如奥尔良、里昂、卢昂、普瓦蒂埃等，国王的官吏

都被驱逐，政权转移到资产阶级手里。关于这两方面，书中都表现得不够，至少不明确。又如：从八十年代起，农民在封建主不断内讧和四处破坏的情况下，展开了强大的反抗运动。在九十年代中发生了所谓“克罗冈”（贫苦汉）运动。这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既反对天主教派，也反对胡根诺教派。书中也未能如实地表现出来，这些不能不说是缺点。

然而以上的缺点不能掩蔽本书的优点和魅力。它在屈指可数的世界文学巨著中，将始终保持它应有的席位。今天我们读这部书，不仅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从反帝反霸反殖的角度来看，它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董 问 樵

1979年10月于上海